

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和实践意义

殷文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当今世界和平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把握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生成逻辑,从中国和平发展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尤为重要。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世界和平观的科学指引以及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丰厚滋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其核心价值指向就是通过和平发展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世界大同。贯穿中国和平发展的具体实践的主线,就是在个体、社会、国家和自然生态4个维度上减少乃至消除各种形式的暴力因素,创造性地非暴力地推动冲突转化,进而以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国和平发展实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思想,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制度变革,丰富了和平文化的意涵,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进程,实现永续和平发展。

关键词:和平;积极和平;冲突转化;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4-0009-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目标,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营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与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努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有着内在的深层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式和平

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和平的意涵,拓展了和平的空间,展现了和平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和多样性,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一、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科学指引和文化支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和一切行动指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对和平发展进行了理论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和

平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平思想也对中国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道路选择与文化的深层影响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1.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世界和平观的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而作为更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为共产主义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使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平发展道路过程中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任务,同时又大力推进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尽管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采用或暴力或和平的方式,但始终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以和平发展为根本价值指向的,这使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特征。

马克思主义崇尚和平,认为和平最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最有利于实现人类本性的价值目标^[1],国家之间应追求基于道德的永久和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世界和平观。—方面,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勾勒和平愿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世界和平观,揭示了所谓“永久和平”的本质是理性和平地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和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以及资本的贪婪逐利性,资本主义国家为攫取争夺超额垄断利润必然会爆发国家间冲突和战争^[2]，“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3]。他们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平观点,对其寄望于少数天才精英人物的英雄主义唯心史观以及“—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4]^[433]的做法予以否定,赋予了工人阶级通过国际努力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并指出“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5]。他们还吸收并发展了黑格尔、赫斯的德国古典哲学观点,在“自由共同体”基础上,创造性提出“自由人联合体”概念,认为这是“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只有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每个人自

由而全面发展,阶级最终消亡,滋生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彻底消除,人们才真正迎来和平世界。另—方面,围绕“怎样实现和平”探索和平的实现方式。马克思肯定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重要性,“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439],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435],同时也认为有些国家的“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7],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也可通过选举、议会活动等和平方式达到斗争目的,实践中“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376]。对于英法两国阶级斗争的不同情形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的解决成为不可避免”^[8]。恩格斯也承认“和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争取“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9]列宁—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敏锐指出“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10],提出了在尊重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前提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可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开展经贸合作的观点,并强调和平相处的同时要警惕帝国主义的破坏,开创了世界两大阵营既合作又斗争的理论先河。综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2. 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丰厚滋养

中华民族历来崇正义、讲仁爱、尚和合、求大同,传统和平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涵盖了个体、社会、国家、自然等各个领域,成为后世和平思想的不竭源泉,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理念与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是注重个体修养,主张正确处理物我关系,将自身内在和平视作外部和平的前提条件。儒家高度重视人的内在和平,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孟子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王阳明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都指出了私欲之于和平的根源性影响,主张适当抑制和削减私欲。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万物—源”“仁者爱物”,将仁爱之心推及万物,以“仁爱”实现人际和平、社会和平。老庄道家则主张“无为”“不争”“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内在和平谋求外部和平。二是注重社会互动,主张正确处理群己关系,将包容退让视作人际

和平的关键因素。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处理分歧、积极谋取共识。老庄道家则认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七十六章》），主张“上善若水”，以包容退让求和平；主张“常宽于物，不削于人”（《庄子·天下》），“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处世待人，构建清新恬淡的人际关系。三是注重施行仁爱，主张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将国内和平视作国家间和平的重要基础。在社会治理上，老子主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补偿制度机制。法家主张“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通过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子产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宽猛相济的政策调整实现动态平衡。在对外关系上，孟子提出“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荀子主张“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施行仁义之道赢得天下臣服。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上》），通过以“利害说利害”成功阻止了楚宋、齐鲁之战，将其和平理念成功付诸实践。老子反对战争，主张知雄守雌、韬光养晦，挫锐解纷、慎战止战，同时也将战争视作万不得已的“以战止战”之策：“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庄子》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即便是兵家也有其独特的和平观，秉持“安国全军之道”，主张“必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军事上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四是注重遵循天道，主张正确处理天人关系，将人类活动视作影响自然生态和平的最大变量。儒家、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对天人和諧展开积极探索。儒家视秩序为和平的前提，注重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1]，“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行礼”^[12]，积极谋求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互动之境。“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

物论》），老庄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主张遵循自然之道实现不谋而治、无为而治。反之，“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庄子·在宥》），人为破坏自然生态便会制造天人对立、打破动态平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所指出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和”文化蕴涵了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的宇宙观、国际观、社会观、道德观以及和平和睦和谐的一贯理念和追求。“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13]中国共产党自觉吸收传统和平思想精华，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加以丰富发展，为探索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

二、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 为和平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现代和平学理论认为，和平并非仅限于没有战争的状态，和平是与暴力相关的概念。暴力是“造成‘现状’与‘潜能’之间差异的原因”，“当一个人不能过上这个世界在原则上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的生活时，他生活的环境就存在暴力。”^[14]暴力可分为自然暴力、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与之相应，和平包括自然和平、直接的积极和平、结构的积极和平、文化的积极和平^[15]⁴⁵⁻⁴⁷。“和平是所有形式的暴力的缺失或减少，和平是非暴力的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15]¹³和平不限于消极的无争端状态，更倾向于“人们的生存权得到名副其实的保障，且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都能得以保障的状态”^[16]⁴⁻⁵。因此，和平又有“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之分，前者指没有战争（直接暴力）的状态，后者指没有结构暴力的状态。“积极和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和创造性地非暴力冲突转化，使个体得以充分的“自我实现”，其丰富的意涵为实践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在此意义上纵观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和平发展道路的奋斗历程，无疑就是矢志不渝追求“积极和平”的过程。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

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因就是消除各种暴力因素、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终极价值就是保障人民各项合法权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发端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互动构成了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环境,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内和平稳定发展则是形成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实践。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条追求“积极和平”的发展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实现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7]。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和平发展提供社会条件、扫除前进障碍

中国共产党早期集中力量组织城市暴动和工人运动,对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于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以暴制暴”“以战止战”和平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土地法律政策的出台,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根据地建设呈现出一派繁荣和平景象。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冲突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全国范围内的和平得以初步实现^[18]。延安整风运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创造性方式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统一。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全民族抗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争取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在解放区管辖、军队等方面作出重大让步,“以退让求和平”的同时又“以斗争求团结”,在军事上击退国民党的进攻,推动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尽管国民党毁约发动内战,但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平的诚意和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筑牢了民意基础。平津战役中,创造性运用“围

而不打”“隔而不围”等策略,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是古代传统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的完美实践,是众多和平路径的“善之善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和平发展提供政治前提、开辟广阔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并粉碎了分裂图谋,实现了大陆的统一。中苏建交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为对外防御侵略、对内开展建设创造了条件。抗美援朝战争中贯彻“边打,边谈,边稳”和“以打促和、以打促谈”的方针,取得了伟大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19]1953年,对印谈判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又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及建议,使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等原则得到广泛认同,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进一步理论创新。积极推动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交,逐步打开了外交崭新局面。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的政策,要求处理好与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积极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循序渐进改变旧有生产方式,和平有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6]¹⁸²⁻¹⁸³。以和平“赎买”的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功实践了马克思经典作家以和平赎买方式“剥夺剥夺者”的设想,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内部矛盾解决方法,形成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和平发展提供体制保证、夯实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成为制定内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军队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上来,精简军队、军民融合有力支援了经

经济建设。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引下,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相继达成“九二共识”和《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协议,两岸相互联系、协商机制不断建立完善,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两岸政党交流启动。2005年发布《反分裂国家法》,对台政策进入“依法遏独、以法促统”阶段。邓小平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力推动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和平解决。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举办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积极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有力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了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高度概括,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以思想解放推动了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现代化建设12个重大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127亿元,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至3209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降至3.5%左右^{[16]296},民生得到明显改善。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加大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系统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系统思维和统筹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有效减少暴力因素滋生,促进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不断

丰富完善积极防御思想,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对新时期内外复杂形势,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妥善处理“占领中环”“旺角暴乱”“修例风波”等事件,通过法治等手段遏制打击“港独”势力,牢牢掌握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在台海局势风云变幻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超凡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稳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进程。全面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建设均衡发展、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开展周边外交,以真实、亲诚理念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和平复兴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提出破解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之策,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力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事件、反恐等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执法安全合作,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和地区合作,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展现了大国大党责任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综合国力持续跃升,社会安定有序,更具凝聚力向心力,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价值规范和引领,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人民群众利益得到更好实现、维护和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发起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力度的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16]514-515},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进一步夯实了和平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和冲突的创造性转化,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党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展现了党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决心,推动中国式和平发展迈向新阶段。

三、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逻辑： 减少暴力滋生、推动冲突非暴力创造性转化

在现代和平学的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统筹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统筹国内与国外、统筹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其主导的和平发展实践在个体、社会、国家和自然生态4个维度上深入展开,涉及自然和平、直接的积极和平、结构的积极和平、文化的积极和平等各领域,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减少暴力和推动创造性非暴力的冲突转化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呈现出“积极的和平”的总体特征。

1. 个体层面:以人为本、保障权益,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人的潜在性身体的或精神的能力受一种影响的作用而被压抑到一定程度时,就显示为‘暴力’。”^[14]5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人的能力发展提供各种物质、文化等条件,就是在压缩暴力空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翻“三座大山”,彻底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赋予公民平等权利,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扫除了制度性障碍。二是提高人民群众综合素质。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有力提升了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三是推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大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四是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民平等自由权利,将人的全面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使之免于遭受各种暴力侵害。五是以发展保障基本人权。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依法保障人权,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20],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消除贫困,让人民全面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最基本的人权。

2. 社会层面:以制为基、推行善治,致力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新社会治理,强化社会建设,积极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是基层“三治融合”。构建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理念、方式、手段创新,实施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德法相济,通过法律、道德等手段积极推动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良法善治。二是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注重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1],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社会化。建立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有效维护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以“最大公约数”指导规范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提升精神境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力推进志愿服务、诚信建设,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带动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推动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良性互动。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积极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四是基层矛盾调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关口进一步前移,将问题解决在基层一线,有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3. 国家层面:以和为贵、转化冲突,致力于营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积极谋求国内和平稳定,保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独立自主开展对外交往,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以和平发展实现伟大复兴。一是以战止战、以暴制暴。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保家卫国、自卫还击,都是以暴力对抗、制止暴力,以暴力革命手段谋求和平发展环境。二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灵活调整土地、统战等政策,在对待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方面采取不同政策策略,最大程度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争取民心民意,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三是和平改造、平稳过渡。创造性运用和平赎买等方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性变革,避免了暴力革命、流血冲突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四是内部整顿、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等运动中,创造性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说服教育等方式方法,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独立自主外交,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六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并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台海交往互动,积极争取实现和平统一。

4. 自然生态层面:以近知远、统筹兼顾,致力于建设共生共荣的生态圈和共同体

站在全人类长远发展的历史高度,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理性审视人类活动的科学性、合理性,正确处理眼前与长远、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自我发展与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7],积极推动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挑战,“世界各国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分歧、克服本位主义、化解矛盾冲突、凝聚全人类力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考量世界治理问题。”^[22]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实质性践行。二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强调人际、代际发展公平性,“不断创新和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制机制”,“以

绿色发展机制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引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23],实现科学永续发展。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觉将人类作为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积极推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从污染到治理的拐点早日实现。四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化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22]。统筹长江经济带建设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高长江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法治化水平。

四、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意义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走过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通过和平发展致力于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世界大同,成功开创了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贺信中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为人民谋求幸福、切实维护人权的过程。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历史性贡献,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实践意义:一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既通过暴力革命赢得和平环境,又通过自身发展避免殖民侵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实现有效平衡,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制度平稳过渡,实行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和平崛起走向伟大复兴,跳出了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陷阱,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24],而不是走向依靠侵略扩张掠夺的殖民主义国家旧式工业化道路。

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住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特点,带领全国人民积极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积极推动和平与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冲突、发展、文明等和平理论热点展开,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进一步丰富拓展了和平发展的意涵,对中国乃至世界和平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是推动了伟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三大历史贡献、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变迁。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中华民族发生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由衰落到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社会制度变革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提供了根本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开辟了光明的前景^[19] 117-118。

四是丰富了和平文化的意涵。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发展,怎样实现和维护和平发展”这一历久弥新重大课题展开百年探索,将和平理论与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吸纳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融汇中外、贯通古今的中国特色和平文化。中国特色和平文化涵盖个人、社会、国家、自然生态各领域,聚焦各种暴力的减少和消除,注重冲突的非暴力创造性转化,在斡旋转圜、和谈和解、争议处置、国家统一、国际交往、人权保障、生态环保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和平的内涵,有力推动了和平学学科建设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凝聚着独特的中国和平思想、和平理念、和平智慧,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理论指引和文化滋养,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进程、实现持久和平永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和平意味着暴力的减少、缺失和不在场,但中国的和平实践证明,在特定条件下,暴力的减少有赖于暴力对抗的有

效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暴力不必然带来和平,但和平往往是暴力的结果或以暴力为支撑的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25],运用暴力革命争取和平,以斗争谋求团结,同时又通过和平发展巩固革命成果,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对外施加霸权影响。这一和平与暴力的辩证法启示我们,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发展促和平则和平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坚强后盾和根本保证,和平往往只是美好的空想和幻象,不仅无法实现,更不可持续。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条件,只有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才能不断巩固和平成果、赢得和平前景。

其次,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用发展成果满足群众需求,以强大综合国力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潜在的”与“现实的”之间差距的原因,暴力反映了人们需求的满足程度,即应该得到与实际得到之间差距。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大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产品供应力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回应广大群众向往和期待,持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大限度减少了暴力滋生的土壤。同时,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不断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和增长点,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贫困、资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从源头上减少了全球暴力滋生和战乱爆发的风险。这一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一心一意谋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须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综合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再次,坚持平等对话协商,有效引导冲突创造性转化,积极推动和平和解进程。和平并非没有冲突,也不是消灭冲突,而是对冲突进行非暴力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无论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重庆谈判、政治协商,还是朝核六方会谈、争议领土边界勘定,都是通过对话协商、调停斡旋、搁置争议等方式积极推动利益攸关方放弃暴力对抗、达成和解合作。积极推动“九二共识”框架

下的两岸对话交流与合作,力求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冲突的创造性转化,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辟了崭新道路。这一转化冲突的经验启示我们,和平取决于各方主观努力,运用创造性思维推动和平和解才是最佳路径选择。必须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开放性弹性架构,注重策略选择和谈判技巧,充分关注彼此核心利益关切,增进互信理解认同,以创造性思维和举措推动冲突和平转化。

最后,尊重文明多样性价值,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不同文明共生共荣。文明固然有别,但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差异未必造成文明冲突,恰恰为文明交流互鉴和丰富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主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从古中外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平等对话、交流合作,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6],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创新发展。这一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启示我们,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唯有和而不同,才能保持不同文明的独特价值,才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展。必须坚守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加强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以跨文化交流消除隔阂误解,增进文化理解认同,努力形成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案,从而共同推动文化融合创新基础上的不同文明间和谐互洽、共生共荣,不断夯实世界持久和平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1] 李爱华.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意蕴论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3): 26-36.

[2] 房广顺, 张雷. 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M]//刘邦凡, 徐敏.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 2013: 14-20.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2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326.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9.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49.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179.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690.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625.

[10] 列宁. 列宁全集:第4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80.

[11]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582.

[12] 张载. 张子正蒙[M]. 王夫之,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26.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47.

[14] 刘成, 埃贡·施皮格尔. 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 图解和平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5] 约翰·加尔通. 和平论[M]. 陈祖洲, 等译.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

[16] 池尾靖志. 和平学入门[M]. 池建新, 朱庆华, 译校.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4.

[17]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 2021(9): 4-18.

[18]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70.

[19]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96.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69-272.

[2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50.

[22] 邓磊, 张翟.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4): 57-63.

[23] 钟慧容, 刘同舫.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经验[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23-31.

[2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28.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第一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267.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41.